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李侃 主编



刘知几评传

——史学批评第一人

赵俊、任宝菊 著

刘知几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 史学家系列 · 李侃 主编

刘知几

评传

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

史学批评第一人

赵俊 任宝菊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

刘知几评传

——史学批评第一人

赵 俊 任宝菊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6.25 印张 插页 7 143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ISBN 7-5435-2555-0/K·77 定价:1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注：据《四库全书》影印本

《新唐书》刘子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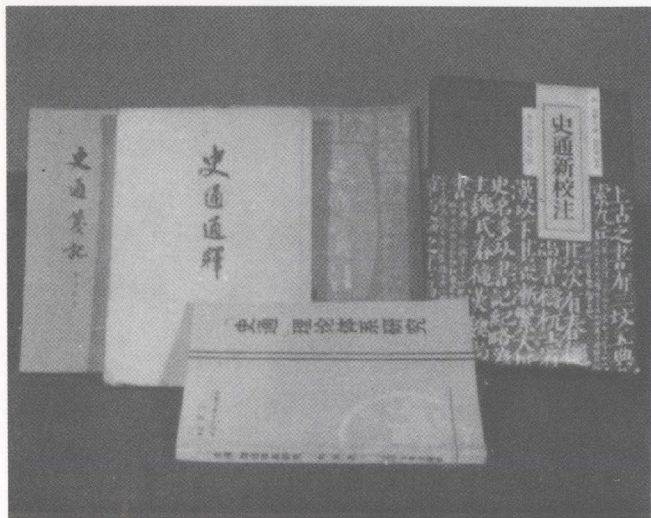
乎？由斯言，則楚南寇之圖，義同於此。不一。秦寇漢，用給食爲常。況我國家道統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現發變通，其樂尚衣冠，調直宜省節。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擄揚，今願變通，其從節，轉難圖矣。凡有衣冠樂，皆備此行。所以規違狂言，用申鄙見。帝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賜入令，以爲之。

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故。九

經上聞而怒之。由是貶安州都督府別駕。子長子顯爲太常令，犯罪削官。子玄胡執政，爲當時所稱。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于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黃金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三長謂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樵採斧斤，終不成其爲室家矣。猶如有志而無學，亦猶思近悅遠服，所以知此，則此爲虎狼焉。善無可知，所向無敵者矣。脫有非是才，不可居居史任，曷言已矣。能進退者，有智見其時，人以此爲難。子玄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遺事，必見其人，時人以爲難。子玄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序：述子無河上公注，修明書寶錄，皆行於世。有卷三十卷。後數年，玄孫爲太常令，犯罪削官。子玄胡執政，爲當時所稱。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于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黃金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三長謂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樵採斧斤，終不成其爲室家矣。猶如有志而無學，亦猶思近悅遠服，所以知此，則此爲虎狼焉。善無可知，所向無敵者矣。脫有非是才，不可居居史任，曷言已矣。能進退者，有智見其時，人以此爲難。子玄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遺事，必見其人，時人以爲難。子玄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二 劉子立

附一：中興



《史通》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总 序

戴逸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宝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无数有益的东西。这其中包括加深对国情的了解、培养爱国主义情操,也包括汲取有益的政治经验、治国方略、管理方法,至于其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哲学智慧、科学思想则可以在更深层次上为我们提供借鉴和素材。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是广大人民群众。一切文化现象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体现。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形成了文化的不同门类。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覆盖面更为拓展,文化的内涵日益深邃,在各门各类的文化活动中也涌现了各自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或者著书立说以成一家之言,或以自己的言论形成一种思想体系,或以自己的实践活动体现出一种文化精神。他们努力钻研,求实创新,把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步步推进,形成一个又一个高峰。这些文化名人如群星璀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其数量之多真如恒河沙数。我们把这些明星贯穿成线,就构成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史。

广西教育出版社倡议编写出版“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一项有卓识有魄力之举,因此立即得到了各方面专家的响应,在几位著名学者主持下,分别组成各系列的写作队伍。由于作者大多长期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因此很快完成了一批书稿。以作者队伍整齐,书稿质量高而言都是少见的。

本系列丛书没有采用学术著作的传统写法,也不对历史事实作子虚乌有的夸张演义,而是本着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传主的活动作尽量生动活泼的叙述。作者的观点或通过分析评论表述,或者寓于史实的叙述之中。对于学术界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则尽量融会吸收。

本丛书所拟定的传主选题,代表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各方面,虽然各位传主卓然成家,足以彪炳史册,但却并非一定是完人。在他们身上既有耀眼的光华,又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历史和个人的局限,甚至不无糟粕。这与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要有清醒的头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称颂、肯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时,也要取这样的态度。

最后,我要感谢广西教育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感谢丛书的各位主编、作者和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希望本丛书能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挥作用。

是为序。

1994年5月

序

李 侃

尊重历史,编纂史书,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优良传统。

古人有很多重视历史的精辟言论,如“彰往而察来”,“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史为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等。

正是由于对历史的重视,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才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代有创新,不断发展,也才能够使得在经过千百年之后,后人还得以从这些历史典籍中窥见以往年代的社会治乱、朝代兴衰、政教得失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我们在接受、领悟这种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赐予的时候,对历史上那些优秀的史学家,不禁由衷地产生出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

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们在传统文化中占有独特的、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文化领域的一种分工,史学家的职责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史学家工作的成果是反映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与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记载及依据。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之所以被完整地记载下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至今还可以脉络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是古代史学家的一大功绩。

在这套“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中,我们选择了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家入传,用以反映中国悠久的史学

传统及其在各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成就。这八位史学家是：司马迁（西汉）、班固（东汉）、刘知几（唐）、杜佑（唐）、司马光（北宋）、郑樵（南宋）、章学诚（清）、梁启超（近代）。这八位史学家是包括从西汉到近代的史学家的代表，他们的著述和思想反映了中国历史典籍的多种体裁，反映了中国史学在各个领域，包括历史记述、历史思想、史学理论、史学跟社会的关系以及史学变革与创新的辉煌成就。

司马迁著《史记》，创纪传体（综合体）通史，并以其深刻的历史哲学、生动的历史表述和以多种体例相配合，描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前期大约 3000 年的历史大势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以及各阶层代表人物的言论、行事与历史功过。《史记》的伟大成就，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

班固受《史记》的影响而断代为史，著为《汉书》，开封建社会皇朝史撰述的先河。《汉书》中的 10 篇志，在典章制度史的研究和撰述上有突出的贡献。后人把《史记》、《汉书》尊为历代“正史”的开山之作。

刘知几以批判的眼光，自觉地对以往的史学工作进行回顾和审视。他著的《史通》一书，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在中外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杜佑重视史学的“经邦”、“致用”，所著《通典》一书，创典制体通史而意在“将施有政”。他是一位通晓政治的史学家，又是一位洞察历史的政治家。

司马光主编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叙战国到五代 1300 余年史事，旨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一部“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的宏伟著作。

郑樵继承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阐扬史学的“会通之旨”，所撰《通志》一书，是纪传体（综合体）通史，而其卓越成就尤在于《通志·略》，显示了他在典章制度、名物训诂、自然知识

方面的造诣。

章学诚生活在考据之学盛行的乾嘉时期，而他治史的旨趣却在于理论的追求，所撰《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从理论上总结了18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明确提出“六经皆史”，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辨“史法”、“史意”之区别，论“史德”、“言公”的重要，发展了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说等等，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最高成就。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上提出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先驱，他在20世纪初年提出的“史界革命”和“新史学”理论，批判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史学改革和创新起了开拓性的作用；他在本世纪20年代的历史撰述，涉及到历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许多领域，在中国近代史学上有广泛的影响。

从司马迁到梁启超，这是一支宏伟的队伍，是一座丰厚的宝库，体现着一个优秀的传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史学家的不同风格和特点，不同的成就和贡献，看出中国史学的连贯、繁富和成熟。

从司马迁到梁启超，我们能够列出有成就的史学家可以以百数，他们的著述，可以汗牛充栋；他们的贡献，可以彪炳千古；他们的传记，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之前的一部传记体的中国史学史。从我们所介绍的八位史学家的成就，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部中国史学史，该是一座多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的宝藏！

中国史学在两三千年的积累、发展中，不但造就了众多的优秀史家，也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这里，我只想说明两点。

第一，能不断创新的传统。

任何一个民族的史学，任何一个时代的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都是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后代史学和史学家对于前代史学和史学家，既有继承，又有批评，既有扬弃，又有创新。这种继承、批评、创新、发

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史学内容愈益丰富、体裁愈益多样、范围愈益扩大、方法愈益完备、史观愈益进步,而终于走上科学轨道的过程。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迁延证明了这一点,而从古代史学到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进而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的转变,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发展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科学事业。史学工作者在向这个科学高峰攀登的过程中,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反复的科学实践。这种探索和实践,绝不可忽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不可忽视中国史学遗产给予我们的启示。

第二,关注现实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史学与每个时代的政治息息相关。从孔子因“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而“作《春秋》”开始,后世许多史家,虽各自的史学思想、政治见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几乎都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脱离现实,离开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治乱盛衰去空谈历史。至于近代中国的许多著名史家如魏源、梁启超、章太炎诸人,他们本身就是政治革新家、维新志士和革命志士;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则是共产主义战士,历史学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专门的科学,同时又是维新和革命战斗的思想理论武器。尽管这个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和表现形式,但也有贯穿古今的精神本质,这就是史学家们对国家、民族命运和“世道人心”的关注,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这正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继承和发扬的优良史学传统。

盛世修史,继往开来。值“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推出之际,谨抱病以陈言,怀古贤,励今哲,翘首于后生。此乃一老史学工作者之赤诚也。

前言

一千二百年前，盛唐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其实，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史学批评家。他的近九万字的著作《史通》，是世界文化宝库中最早的一部史学批评专著，比西方最早的同类著作《古文书学》（法兰西史家马必雍著）早九百年。

因为有了刘知几，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古代史学称雄于世界，不仅在于她有浩如烟海的、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史籍，还在于她有较发达的史家批评及史学理论。这就证明：中国学者不单具有考据、辨伪、编纂能力，而且也不乏思辨能力和系统反思能力。

气势恢弘的盛唐文化造就了刘知几，刘知几也以《史通》为盛唐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往一千余年的史学批评实践给刘知几提供了理论概括和综合分析的基础，刘知几对史学批评的系统反思和集大成贡献又给予后世史学以深远的影响。

刘知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他 11 岁时，被父亲督逼学习《尚书》，虽然屡受体罚，也学不进去，但偷偷去听讲《左传》，则立刻着迷，从此学史不怠，一发而不可收。

他在诗赋方面亦有天分，在准备科考之时已“获誉于当时”。20 岁一举考中进士，授官获嘉主簿。恰值世风重文之时，他若倾力于文坛、政坛发展，前景光明自不待言。可他偏“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硬是一门心思钻研史学。亲朋好友大惑不解，史学并非“趋时之具”呀！这一选择，使他自己名声下降，备遭冷落，居主簿任上竟一连 19 年未能升迁。这一选择，使中国文化名人之列增加了一位“第一史评家”。

他虽志在史学，也常牵挂国事。以九品芝麻官身份上二疏二表，讥刺官员冗滥，批评大赦太繁，使得刚愎暴戾的武则天女皇帝也“嘉其直”。

他为人高洁，不喜官场应酬。青年时代“常恨时无同好”。调入京城后，渐渐有了徐坚、朱敬则、吴兢等知音，他们志趣相投，肝胆相照。在政治上，他们正派廉洁，抨击时弊；在学术上，他们相互砥砺，支持创新。

他经历了一个政局极为动荡的时期，历经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帝。他目睹了武则天改朝换代的种种惊人之举，鼓励告密，重用酷吏；皇帝、太子，屡立屡黜；王公大臣，成批杀戮。官场腥风血雨，宫闱刀光剑影。刘知几作《思慎赋》置于案头，时刻提醒自己慎言语，慎交往，避嫌疑，表达出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严酷环境中错综复杂、备受压抑的心态。他内心充满了矛盾，既要有所作为，又要知足引退；本是在兢兢业业，个人奋斗，又觉得贵不如贱，动不如静。

他的刚强耿直性格有时总压不住，将“思慎”的座右铭弃之不顾，还是在政治是非问题上表态。在武则天面首张昌宗诬陷宰相魏元忠时，他没有袖手旁观。

献身史学是他少年时就立下的志向，做朝廷史官更是埋藏心中许久的夙愿。他经过二十年的行政生涯，年过不惑才

成为史官。然而，监修贵臣专横，引进史官多为庸才。史馆内派系林立，乌烟瘴气。刘知几不肯同流合污，处境尴尬，时仅五年，已有脱离史馆念头，遂利用朝廷西迁之机，留守东都，在园林中闭门不出，读书著述。三年后被召回长安，重执史笔。

他在史馆抑郁寡欢，又被监修肖至忠责以撰述不力，遂愤而提出辞去史职。辞职书历数史馆弊端，“五不可”之论振聋发聩，成为史学史上一著名文献。

由于在史馆“言不见用”，不能实践自己的史学主张，他发愤撰述《史通》，全面系统阐述对古今史学的看法。书成后，见者多苛责，唯徐坚称赞此书为史家的座右铭。

《史通》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此书是对中国史学发展史的最早的系统研究。这样说有四点理由：其一，《史通》对远古至初唐约三千年间的众多史家和史书进行了评述，计有 265 名史家，249 部史书；其二，《史通》虽然以研究汉民族史学为主，但也对羌族、氐族、匈奴族、鲜卑族等少数民族的史学状况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其三，《史通》对史学诸要素的析论，往往是结合史学发展历程进行的，揭示出史学诸要素在不同时期的演变情况；其四，《史通》在总结前代史学时，表现出较自觉的划分史学阶段的思想。这是他对史学史学科的杰出贡献。

第二，此书集前代史学批评理论之大成。首先，从批评形式上看，以往的史学批评，或是零散穿插于史著或其他著作中，或是以序跋、专论的形式单独成篇，而专门以史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则是自《史通》始。其次，从批评视野上看，《史通》以至少 46 个专题，对古往今来的史家、史书、史学研究方法、史学编纂方法等进行了专门研究评述，对当时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问题几乎囊括无遗，表明史学学科的自觉意识和史家对宏观微观问题的把握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再次，从批评的深度来看，《史通》以扬名教和求实录为史学批评为主要原则，以史制、史家、史书、史评为主要线索，以“与夺”、“褒

贬”、“鉴戒”、“讽刺”为主要评论手段,对有关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都进行了较为深思熟虑的探讨。

《史通》填补了中外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史学批评专著的空白,《史通》是人类在史学研究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目 录

总序	(1)
序	(1)
前言	(1)
一、青少年时代	(1)
1. 诗书人家	(1)
2. 爱史不爱经	(4)
3. 给古人挑错	(7)
4. 早登仕途	(8)
5. 上书武则天	(12)
二、中年时代	(21)
1. 屠刀下的反思	(21)
2. 惊人的史学抱负	(35)
3. “相得甚欢”的朋友	(42)
4. 改不掉的脾气	(51)
5. 史官的苦乐年华	(57)

6. 世族乎？庶族乎？	(72)
三、晚年时代	(80)
1. “取乐丘园”之真相	(80)
2. “辞职”书成千古佳作	(83)
3. 发愤写《史通》	(93)
4. 晚年的彷徨	(103)
5. 凄凉的结局	(112)
四、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史学发展史	(116)
1. 《史通》是一部什么书	(116)
2. 《史通》对先秦、秦汉史学的研究	(125)
3. 《史通》对魏晋十六国史学的研究	(133)
4. 《史通》对南北朝史学的研究	(144)
5. 《史通》对隋及唐初史学的研究	(152)
五、集前代史学批评理论之大成	(161)
1. 《史通》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	(161)
2. 《史通》如何看待史学的社会作用	(164)
3. 《史通》如何看待史家修养	(166)
4. 《史通》如何看待史料选择	(169)
5. 《史通》如何看待史书体裁和体例	(172)
6. 《史通》如何看待文字表述	(176)
7. 是非功过，任人评说	(179)